

## 防区制时期四川军阀筹饷机制及公平性危机

娄 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00)

【摘要】四川军阀何以能够维持长达十七年的割据统治,这牵扯出经济史领域内一个值得关注的基层财税实践议题。江津县的个案表明,民国初年的财税整理措施,使军饷嵌入地方财税系统,“就地筹饷”原则由此形成。在县城,商人充当军饷抬垫的主体,并从中赚取20%的年利;在乡村,“抬垫军饷”实为强制性税收预征,且征收对象主要是那些田产收益较多的富绅群体。四川军阀在筹饷的过程中,不仅借助民间金融市场的资本力量以增强其资源汲取效率,而且还兼顾了乡村基层社会的稳定性。但这种筹饷机制使地方社会引发了严重的公平性危机,进而加速了地方精英与金融资本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进程,拉大了近代以来衍生的城乡差距。

【关键词】防区制时期;筹饷;抬垫;基层社会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5)02-0077-13

## The Mechanism of Sichuan Warlords Raising Military Funds and Fairness Crisis during the Period of Defense Zone System

LOU M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00)

**Abstract:** How Sichuan warlords were able to maintain their seventeen years of separatist rule was a noteworthy grassroots financial and tax practice issue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case of Jiangjin County shows that the financial and tax consolidation measur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egrated military pay into local financial and tax systems, and the principle of "raising pay on site" was subsequently formed. In the county town, merchants acted as the main body of advancing payment and earned an annual profit of 20% from it. In rural areas, advancing military pay was actually a mandatory pre-tax collection, and the main target of the collection was the wealthy gentry who had more income from their land. In the process of raising salaries, Sichuan warlords not only relied on the capital power of the private financial market to enhance their resource extrac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took into account the stability of rural grassroots society. But the mechanism of raising military funds has caused a serious crisis of fairness in local society,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local elites and financial capital flowing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and widening the urban-rural gap that has emerged since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defense zone system; raising military funds; advancing payment; grass-root society

[收稿日期] 2023-0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江津档案所见近代乡村地权纠纷及基层治理研究”(21CZS080)

[作者简介] 娄敏(1988- ),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 引言

辛亥革命后,地方社会的军队私人化与割据现象随之产生。其中,四川军阀割据问题尤为严重,该省军阀混战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危害之重,堪称全国之冠<sup>①</sup>。至防区制时期<sup>②</sup>,频繁的战争及不断扩编的军队,使地方政府对驻防区民众的财税汲取需求不断加增。1935年,蒋介石势力深入四川,使该地区长达二十四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彻底结束。值得思考的是,在这17年间,地方政府究竟采用怎样的征饷办法来供养驻地军阀呢?

限于资料缘故,前辈学者对各地军阀向地方社会汲取资源的过程性研究,还不多见。多数研究只能根据粗略的报纸记载,进行概括性描述,并以此谴责军阀在地方社会上竭泽而渔式的财政经济政策<sup>③</sup>。即便涉及筹饷手段,也仅限于介绍乡村社会中粮税的“预征”或“垫款”现象,而未能系统阐释筹饷机制的运作过程,更少谈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

近期,曹树基关于四川省与江津县的财税研究发现,1912—1934年四川地方政治形态的演变是循着“军饷—税收”的框架展开的。考虑到军阀割据时期四川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或相当一部分直接成为军饷之来源,且军队直接介入地方税收,曹氏将该现象称之为“财政军事化”<sup>④</sup>。这一概念精准地概括了军饷与税收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防区制时期驻地军阀的筹饷机制。

## 一、县级财税恢复与“就地筹饷”原则的形成

辛亥革命后,现代的民主共和制取代了传统的君主专制,但社会经济层面上中央至地方的财税系统陷入混乱。如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所言,自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中国在政治上是进步的,而在社会上是倒退的<sup>⑤</sup>。经济上也同样如此。尤其在防区制时期,地方税收几乎完全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该现象被学界视为军阀的横征暴敛<sup>⑥</sup>。

匡珊吉的研究表明,(四川省)一切税收均由防区内最高军事首领各自筹谋,自由征取;一切支出,亦由他们视其政治、军事、经济之需要自由支配。省城虽设有财政厅,实属虚名<sup>⑦</sup>。诚然,防区制时期的四川省地方各军阀势力已独立于省级以上的中央政府,财税收支范畴内的自由权限是其最显著的表现。

## (一)县级财税秩序的恢复与调整

自辛亥革命起,江津县基层财税秩序便开始陷入混乱。1912年,江津县撤销前清县征收局,改设江津县征收课。由于军阀之间的混战频繁发生,江津县的政府公款与应解国税一直被川、滇、黔等各路军队强行提充,用作军饷。

① 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绪论”,第1页。

② 所谓“防区制”时期,是指1918年至1935年。自1918年四川省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督川后,四川省境内各军阀之间呈现均衡态势,就地征收军需粮饷,进而形成了军阀割据的防区体制,直到1935年结束。

③ 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

④ 曹树基:《军饷与税收:民国时期四川军队与商人的关系——以江津商业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5期。

⑤ [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0页。

⑥ 柯伟明:《民国时期财政分权体制下田赋归属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张廷良、段炼:《民国时期江津地方赋税票据整理研究》,《农业考古》2018年第4期。

⑦ 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9—350页。

在四川,军队征敛赋税的现象肇始于1912年1月4日,即重庆蜀军政府与援川滇军代表援川巡按使陈先源在重庆签订合同条约。其中,涉及军队饷银的条款如下:

(第2条)蜀军政府请托援川滇军协力维持大局,滇军到川之两师团,关于饷项事件,蜀军有担任协助之责,但当运转不周时,得由滇军就地筹借各公款应急,日后统由蜀军政府筹还。附注饷项每月约伍万两……

(第5条)援川滇军受蜀军政府请托后,滇军进行所过之后路,其各种行政机关,由蜀军政府自行建设;但于滇军有密切关系之地及运输粮草各事,得由滇军直接令该地方行政机关筹办,务期于滇军进行毫无窒碍。<sup>①</sup>

这两则条款,即为入川滇军(云南军队)就地委派官吏征收赋税,以充军饷的重要依据。此后,四川各县驻军与地方民军纷纷效仿滇军行为,霸占地方税收,严重扰乱了基层财税秩序。

1912年4月18日,为重新控制各县税收,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下令“严禁提拨地方公款并擅收捐税”。该文书先强调了各县税收与四川省军政府之间财政收入之间的紧密联系,接着便指出当前存在假借“同志军”(清末反清革命武装)身份以提拨地方公款与擅收捐税的违法扰民现象,最后则要求各府州县官员严密调查,惩治奸徒<sup>②</sup>。于是,各县地方官员将此命令以告示的形式,张贴在各县城镇市场,广而告之。

新旧政权更替之际,除军队趁机抢夺县级税款外,地方士绅群体也趁机侵蚀公款。四川省政府专门向各县发出通告,严厉批评地方士绅借办团防名义暗中把持县级税款的不法现象。因此,四川军政府财政司将士绅这种“妨害公益,不体时艰”的行为,定性为“社会败类”之举。此外,四川省政府专门给各地县知事发去剖文,要求县知事严格监察<sup>③</sup>。所谓“团防”,即兴办团练,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类似于传统时期的保甲组织。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团练既是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民间武装组织,又是民国时期的基层征税机关。周锡瑞基于湖南的个案研究也发现,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地方士绅为兴办团练而向民众征收捐税的行为,已经导致地方社会民怨沸腾<sup>④</sup>。

为应对地方士绅侵蚀公款的问题,四川省财政司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要求地方县知事对官绅挪移公款行为负责,即无论地方绅首办理何项公事,非禀准有案,不得擅行抽收税捐,即挪用应解公款。如有不遵,则追究该县县知事的责任<sup>⑤</sup>。其二,要求对县级税款的征解过程给予相关规定,即四川省财政司只允许地方政府从契税项下扣支地方公费,不准擅动应征解至省的税款。除非契税项不敷地方公费开支,府州县政府方可呈文向财政司请求拨款。具体程序则表现为“虚解虚领”的报销拨款过程<sup>⑥</sup>。县级财政与省级财政之间开始形成“申请-报销”的税收划拨关系。

同样,各路军队直接向地方政府拨用饷银的行为也被明文禁止。如果出现拨用地方税款的情形,则仍需补开“印领”(即单据)交给地方官,送至财政司核明,并通知军需处与军需局“扣还归款”。简言之,各路军队不得越过军需局、军需处与财政司,而经向地方官拨用,否则将被定性为“私相授受”。1912年5月31日,四川省财政司向四川北伐各军与各县地方官下令,如军队与地方政府之间再发生“私相授受”关系,则由经手之人承担赔偿责任,以儆效尤<sup>⑦</sup>。

① 四川文史研究馆资料室:《四川军阀对田赋的搜刮》,收录于《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9-360页。

② 《都督令严禁提拨地方公款并擅收捐税》(1912年4月18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1-1-1。

③ 《大汉军政府给县知事的剖文》(1912年),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1-1-1。

④ [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77页。

⑤ 《无论地方绅首办理何项公事,非禀准有案,不得擅行抽收税捐,暨挪用应解公款行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1-1-1。

⑥ 《四川财政司令》(1912年5月28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1-1-1。

⑦ 《令各路军队不得迳向地方官拨用饷银》(1912年5月31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1-1-1。

此外,财政司还取消了战乱期间允许宣慰使(负责维护辖区内治安与处理地方重大事务)“就地提款”的规定,理由是“现今兵事已息,各处应解之款,当极力清厘,促其陆续解省,于财政规划,始有准绳。”<sup>①</sup>

以上关于县级财税秩序的一系列整顿措施表明,军饷隶属于省财政范畴,各军队必须按照报销拨款程序——“虚解虚领”,以解决军饷筹集问题。这些措施实际上为1918年四川省防区制下“就地起征”的军饷筹集机制之形成,提供了政策性依据。

## (二)“就地筹饷”的缘起及特征

“就地筹饷”原则是四川境内各军阀混战与割据的产物。自民国初年起,川、黔、滇三股军阀势力,先后展开了十多年的混战和拉锯战。至1917年10月4日,刘存厚逐走滇系军阀罗佩金与黔系军阀戴戡后,以四川陆军第一军司令部名义发出关于“就地划饷”的训令,具体内容如下:

近查驻防省外各该部队请领饷费,文电交驰,大都盼款至极,情甚迫切。而各县局征款又解运不及,应付殊难适洽。既有此种情形,深虑各队或受艰困,将维持要政之本心,转恐有碍军事,致滋贻误。爰飭军需处妥商该厅改定办法,按照各该部队月需饷款军费,估计概数,并就各该防区较近征局,分别划配,准予径拨税款应用,以期敏活而利戎机。<sup>②</sup>

该文件最早提出“就地划拨”的军饷原则。刘存厚之所以要求改定拨饷办法,主要因为原先各县征收局征解的税款难以及时地按月供应军饷,以致贻误战局。1918年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督川时,原先的“就地划饷”又变为“就地筹饷”。此时,四川境内各军阀之间已经呈现均衡态势,形成了军阀划区割据的防区体制。通常,防区制时期的各县征收局局长均为驻军委派,进而彻底成为驻地军阀的筹饷工具。其中,田赋、盐税等十七目国税,以及田赋附加税、商税等二十目地方税,均属于供应驻军军饷的主要税源。

1921年7月,刘湘被推举为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7月20日,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展开以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为目的的“倒王战争”。当时刘湘正欲向外发展,因此在熊克武的支持下组织援鄂军,卷入了波及湘鄂川三省的大规模战争。为供应前线物资,刘湘以“公债”名义在各防区筹饷。1921年11月15日,四川陆军第三军第七师兼援鄂军中路总指挥部给江津征收局长龚源下达训令,内容如下:

四川总司令刘虞电开,查江津早派债款捌萬元,除提壹万伍千元,作总部采购军米草鞋外,余款准如数拨给该师。但前敌军食需甚孔亟,所提采购之数,并仰吻催早日购齐运济为盼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亟令行,仰该局长即便遵照迅速催收缴解济用为要。<sup>③</sup>

地处长江上游的江津县属于川东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先后被贵州军阀与四川军阀占领,且长期属于川军刘存厚与刘湘叔侄军队的防区范围。按照刘湘的指示,江津县征收局需完成八万元公债的摊派任务。此处之“债”,名义上是四川省政府发行的“公债”,但实质上已变成各县供养驻军的一种强制性税收。

1921年11月26日,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向江津县知事与征收局局长发布公文,名为“呈解七师公债生洋壹万元交冷委员”,具体介绍了公债的征收机制<sup>④</sup>。公文中多次提及的“凭单”,实际上是军

①《宣慰使预订经费无庸到处零提》(1912年),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1-1-1。

②《四川财政汇编》,收录于《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0页。

③《四川陆军第三军第七师兼援鄂军中路总指挥部关于催缴军饷给江津县征收局的训令》(1921年11月15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1-0001-0004。

④《江津县征收局关于解缴公债款上四川陆军第三军第七师的呈》(1921年11月27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1-0001-0004。



饷嵌入中央至地方财税系统的关键媒介。其具体操作过程如下:首先,四川省财政厅印制拨款凭单,交给第七师师部。然后,当驻地军队筹集军饷时,江津县征收局需将税款送到第七师师部,用作每月发给军队的军饷,再换取第七师师部从财政厅领取的“凭单”。最后,江津县征收局将领回的“凭单”送至省财政厅,作为抵销县征收局征解税款的凭据。

可见,“凭单”已成为四川省财政厅、江津县征收局以及第七师之间“就地筹饷”的程序性载体。同样,在县以下的军饷筹集过程中,县征收局印制的凭单是用来抵销粮户每年应缴纳粮税的官方凭证。凭证如何运作,以及将存在怎样的操作障碍,后文将做进一步介绍。

“就地筹饷”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川军,即便是客军进川也同样如此。1924年,川军与黔军在江津县展开拉锯战,最终江津县成为黔军防区。9月10日,黔军第一师师长王天培向时任江津县知事的乔运亨发出飭令,要求“所有该县各征收机关征收事宜,由九月壹号起一律归本部经理”,征税的具体工作主要由黔军一师军需处长廖永岁和咨议员袁期先二人负责,若有违背,即以军法惩处<sup>①</sup>。9月12日,乔知事立刻将此飭令以公函形式抄送给江津县征收局、烟酒局、船捐局、护商所与禁烟查缉处这五个征收机构。随后,江津县地方征税机构便成为供应黔军军饷的征税工具。

在驻地军阀与地方政府看来,防区制时期的“就地筹饷”并未增加民众的税收负担,理由是“就地筹饷”没有超出地方财税范畴,税收总量并未增长。1926年江津县知事公署和征收局发给商会的公函中,重点强调了这一观点。详情如下:

如果加捐令筹,不免重滋扰累,本旅长斟酌地方情形,召集绅商筹议。至再惟有预征民国十九年粮税较为妥协,盖以人民所纳系属国家正供,本军于税收之外,更无苛求之嫌……亟应责成该知事会同征收局长在十九年粮税开征以前,先向城乡富绅商贾裁粮抵借,招垫洋肆万元。<sup>②</sup>

既然军饷属于税收范畴,那么人民所纳实属“国家正供”。因此,县知事认为筹集军饷并非是在原税收基础上再增捐税,进而不会增加民众纳税负担。鉴于军粮紧急,军方要求江津县知事与征收局局长以1930年的粮税作为抵押,向城乡富绅商贾招垫四万元。完成军饷任务后,县征收局再开征粮税,偿还垫款。

由上可知,防区制时期的军饷征收并非完全无序,它反而是作为嵌入县至省财税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这大概是自民国初年起四川各县驻地军阀能够源源不断获得军饷,且未引发大规模民众抗税现象的原因之一。但由于军事权力凌驾于地方政府的权力,以致军饷支出完全不受地方财税体系的控制。因此,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军饷数量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税收需求也必然无限扩大。

## 二、县城商人抬垫军饷及其制度保障

“就地筹饷”原则形成后,主管全县田赋的各县征收局演变成驻地军阀筹集军饷的官方权威性机构。然而,随着战事愈加频繁,以及驻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饷支出随之遽增,各县征收局如何能够如期如数地完成军饷任务,则是本节主要探讨的问题。

### (一)商人抬垫的资金来源及利润

基层财税领域内的抬垫现象,最早源于明代包税制,反映出民间金融市场与基层财税实践之间紧密且复杂的互动关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四川省各州县逐渐形成并完善了以抵押粮税为条件的抬垫制度。防区制时期,江津县政府与征收局为完成军饷任务,至少要经历两次粮税抬垫。第一层抬垫,即县城内的抬垫任务,主要由江津县城里颇具经济实力的商绅承担。第二层抬垫,即乡镇内的抬垫任务,主

<sup>①</sup>《奉黔军第一师师长王令飭税收一律归师部办理》(1924年9月12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29-00132。

<sup>②</sup>《江津县知事征收局给江津县商会的公函》(1926年),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11-0001-004330000。

要由地租收益多的富绅承担。以下主要考察县城内的商人抬垫过程。

以“抬垫”(或垫,或借垫,或筹垫)为关键词对江津司法档案进行检索发现,1918年至1935年间仅有9例案件与商人抬垫有关。通常,只有当纠纷发生时,商人参与军饷公务的案件才会形成。长达17年之久的防区制时期,商人抬垫纠纷仅有9例,这大概也能说明在军饷筹集的过程中,商人的抬垫风险不算太高。其中,发生于1925年的吴善平案,是9例商人抬垫案件中历时最长的一则。吴善平,54岁,是一位在江津县城通泰门正街“理贸为业”的商人兼士绅,其名下拥有一些铺面和铺房,资产约有五千元。

吴善平不仅具有殷实的经济实力,而且还在江津县城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因此有能力在同一年获得两次抬垫军饷的机会。第一次抬垫发生在1923年正月。当时,江津县知事下令筹垫军饷,具体金额、利率以及收回本息的时间不详。第二次抬垫发生在1923年5月9日。当时,四川陆军第四师师长杨春芳率军进入江津县。江津县知事第二次下令抬垫军饷,总金额共八万元,县知事承诺以1924年粮税作抵。

经地方士绅议决之后,由城厢五团各士绅暂行借垫。商人兼士绅吴善平预垫现洋“五百元”,交由商会会长陈邦治之手,最后转交地方士绅兼收支所所长杨锡藻缴解。垫款交付后,吴善平收到一张江津县收支所所长出具的收据,上面盖有江津县商会正副会长陈邦治、江雨琴以及收支所所长杨锡藻三人的私章,且注明“以二分行息,限一月内本息如数拨还”。该收据的形式、内容几乎与民间借约完全一样(图1)。



图1 吴善平抬垫军饷的收据凭证<sup>①</sup>

根据案情的发展过程可知,吴善平的垫款主要来自江津县城内的民间金融市场。1924年12月3日,吴善平在向县知事递交的状书中详细交代了垫款来源。详情如下:

去旧五月因县公署奉令筹垫军饷捌萬元,商会会长陈邦治派商预垫生洋伍百元,无出。邦治作成,套商在伊外甥郑炳荣约,约借银叁百两。又由商外措洋捌拾元,共凑成生洋伍百元,商亲交陈邦治代缴……否邦治匿不与面,反挟呈控之忿,兼乘炳荣已故,邦治忿嗾炳荣之妻郑孙

<sup>①</sup>《吴善平案》(1924年8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497。

氏向商逼索已垫付利洋玖拾捌元。<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吴善平强调垫款是被商会会长“派”(摊派之意)到自己头上的,自己借款也是因为被“套”(欺骗之意),但这些词汇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诉讼策略,因为吴善平在抬垫过程中是实际的获利方。结合吴善平的债权人—妻郑孙氏的状词来看,吴善平向郑炳荣实借420元,加上自己手中的80元,凑足了500元垫款。吴郑二人的借贷关系同样有纸质借据。并且,吴善平也承认自己曾向郑孙氏支付利息98元。郑孙氏提供的借约信息也显示,“每月利息银五两”<sup>②</sup>。因此,极有可能是债权人为规避银两与银元之间的兑换比例波动影响自己的收益,故而要求债务人以银两结算利息。

上述内容显示,商人吴善平主要借助民间金融市场完成官方垫款任务。在这个涉及“军阀—县公署/征收局—收支所—商会—吴善平—郑炳荣—其他人”的连锁性债务关系中,收支所与商会充当借贷中间人,向抬垫人暨债权人吴善平承担债务担保责任。债权人吴善平同时也是债务人,他还需向其债权人郑炳荣支付19%的年利率<sup>③</sup>,但他却能从中获得年利率5%<sup>④</sup>的利息差。另外,郑炳荣的妻子郑孙氏也强调,借给吴善平的420元是通过民间金融市场向他人筹借的。不难看出,江津县城内第一层军饷抬垫主要由富有商人、地方士绅、商会、收支所之间相互合作而完成。这些群体之间互惠互利的纽带是民间借贷过程中层层产生的利息差,而充当借贷关系之抵押担保物的标的物则是公权力范畴的粮税。

## (二)商人抬垫纠纷及其审理逻辑

追逐利益是商人天性,这也是商人与地方政府合作完成军饷任务的重要原因。同时,商人之所以连续十多年都愿意与地方政府合作,除了诱人的利息之外,还因为他们的利益能够在商人抬垫纠纷的审理中得到维护。

吴善平的第二次抬垫,最终引发了耗时三年多的诉讼案。据吴善平称,抬垫的四个月过后,收支所所长杨锡藻并未按约支付本金与利息。1923年9月21日,吴善平为追还此次垫款,向县知事状告杨锡藻,并在状书中强调:“俾民前款有着,而后开预垫等款,不难遵从,则民国幸甚,公款亦幸。”<sup>⑤</sup>吴善平有意将商人预垫与政府公款视为利益共同体,二者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关系。

江津县知事十分认同吴善平所强调的官商关系,于10月3日给予回复,详情如下:

所呈如果不虚,该绅杨锡藻办事殊欠平允,仰该呈持批与该绅妥为交涉,务期款有着落,不至久假不归,庶贻公道,而符人望。<sup>⑥</sup>

原来,收支所所长杨锡藻的身份也是地方士绅。基于身份认同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应是商绅吴善平积极参与军饷抬垫的原因之一,更是整个民国时期官商多次达成合作的重要前提。对于吴善平未能如期收归垫款本息一事,县知事认为这是因为充当担保人的士绅杨锡藻办事不够“平允公道”所致,故授权吴善平持批文向杨锡藻追讨垫款本息。

吴善平持批文多次去找杨锡藻,却始终被拒。无奈之下,他向借贷中间人即商会会长陈邦治报告,但后者“言语支吾、置之不理”。1923年10月10日,吴善平第二次向县知事递交诉状。此次被告人不仅有收支所所长杨锡藻,还有商会会长陈邦治与商会文牒樊少海二人,内容如下:

①《吴善平案》(1924年8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497。

②《吴善平案》(1924年8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497。《郑孙氏案》(1925年11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633。

③借期自1923年5月起,至1924年12月,共20个月。根据双方状词可知,每月利息银5两,吴善平已支付了15个月,共计75两,折合银元98元。大概拖欠5个月利息未支付,这应是1925年债权人郑孙氏状告吴善平引发三角债诉讼纠纷的直接原因。据上述信息可知,吴善平向债权人借款的年利率为19%。(98/15/420\*12≈0.19)

④24%-19%=5%

⑤《吴善平案》(1924年8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497。

⑥同上。



今杨锡藻已将民国十三年粮税银追收八九万两,民应在此次粮税银项下归回预垫,前经公众酌议,证据朗凭,可查。何堪杨锡藻握指此银,独不还民一人乎?民虽至愚至弱,亦知此公议断不敢废,适值前任交卸在急,诚恐批谕无效……为此来辕录恳作主,或提质讯判,或明白批示直接交涉,静候示下。<sup>①</sup>

1923年5月9日的抬垫是以1924年粮税作抵押,因此收支所所长杨锡藻追收到1924年粮税后,本应立即归还本利。一年粮税多达八九万两白银,以一两白银折合银元一元六角计,杨锡藻共收银元136000元,即便除去抬垫本金80000元外,杨锡藻手中大概还应剩56000元用于偿还利息<sup>②</sup>。在恰逢江津县知事换届之际,吴善平寄希望于时任县知事的童毅能为他主持公道,追还垫款本息,以免夜长梦多。

然而,至1924年7月,其他各绅借垫均已回收本息,唯独吴善平依然未获分厘。更令其焦虑的是,当时杨锡藻已卸任收支所所长一职,而新任所长钟鹤雏却拒绝承担债务责任,理由是:收支所账簿无凭查考,不与其相涉。另外,钟鹤雏还在7月10日的收支所会议上表示,吴善平垫款一事应由商会会长陈邦治担负完全责任,与收支所毫无关系。新任收支所所长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吴善平,于是他第三次向县知事递交状书,痛批陈邦治、杨锡藻与江雨琴三人“借公营私、情同抢劫”等违法行为。

为使新任县知事乔运亨重视此案,吴善平强调:“此风一倡,将来军饷借垫,无人允可,筹垫维艰,后害何堪?”言语中带有威胁的意味,意思是若任由借公营私而违背借贷信用,则今后商人将不敢继续出资抬垫军饷。乔运亨接到状书后,对此案存有疑虑。为谨慎起见,乔运亨要求商会对此案重新调查。但两月过后,对于吴善平的垫款本息应如何偿还一事,商会与收支所开始相互推卸责任。

10月3日,吴善平递交了第四份状书。或许是由于案子持续时间过久而未能结束,引起了县知事乔运亨的不满。4日,乔运亨在批文中指出:仍仰执票赴收支所交涉,如何筹还,自有着落,垫款所关,决不致使该商一人吃亏也。显然,相对于之前的批文,语气上更加强硬。面对来自乔知事的压力,收支所第一次做出正面回应,详细回应了之前批文中“吴善平前次垫款五百元系以何税作抵,究应如何归还”的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系征收局陈前局肇璜奉四川陆军第四师杨师长春芳命令,以十三年粮税抵借肆万元,其时四师部催解甚急,各镇乡摊派各款,一时措办不及,始由陈局长暂向城绅息借垫解,并央县商会及本所会出借条,注明限期一月,即以所收十三年粮税预垫归还。各绅缴款,亦各逐缴征局,本所并未登账,故商会同本所虽出有借款,而实未经手也;且条注一月内拨还,系由垫款之家,持向征收局拨领。不过,善平当时失于觉察,以致闾城垫款绅商均各照数领回,而于善平独自向隅,六月以后,又因周师长西成在此变动,陈前局长遂乘间潜逃,致使善平分厘未归……此时即持有借票,而究应如何归还,非有陈前局长在近,不能理清此事也。<sup>③</sup>

该公文不仅详细讲述了垫款的形成过程,明确了1924年粮税为吴善平垫款的抵押标的,而且还指出吴善平垫款难以归还的两个原因:其一是吴善平未能按期持票领款,其二是驻防的军队变动。即1923年士绅垫款后,川军周西成师长在江津县城内易旗,前驻军所任命的征收局局长陈肇璜乘机潜逃。10月10日,县知事乔运亨认为,吴善平垫出之款虽由前局长主借,但系由商会及该所一同出具担保,且既然垫款尚未还清,理应由担保方设法偿还,以免人民遭受损失。

财政清理处对此给出了同样的审理意见:此款收支所并无收数,应由铃章之人负责等由。意思是垫款因“公”而起,但因公账并无收支记录,所以吴善平垫款本息应属私债范畴。按照民间借贷规则,应由

①《吴善平案》(1924年8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497。

② 白银八、九万两,折中估计为白银85000两。1924年粮税折成银元为136000元(85000\*1.6),超过军饷56000元(136000-80000)。

③《吴善平案》(1924年8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497。



出具收条的担保人商会会长陈邦治与原收支所杨锡藻偿还。但后者依旧拒绝履行债务责任。

至1925年11月,吴善平因未能及时偿还其债权人郑炳荣的借款420元,而又被债权人的妻子郑孙氏告上了县行政公署。因军饷抬垫导致的连锁性借贷关系,演变成复杂的债务纠纷。夹在连锁借贷中间环节的吴善平,左右为难。为早日追还垫款本息,摆脱诉讼之累,吴善平将诉状递至上一级的司法机关即巴县地方审判厅。1926年5月,巴县审判厅强调吴善平与郑孙氏二人的债权均具有正当性,且私人债权利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最终给出的判决意见如下:

本案上诉人约借郑炳荣之银三百两,以为垫给,驻军饷款,虽为被上诉人陈邦治等所经手,而此项垫款业已由县呈,准四川财政厅令饬筹还。自不得谓之无着,即被上诉人陈邦治等亦不得谓有欺诈情事,则该上诉人约借之款显然各别,岂容混为一谈,况既係亲笔立约,又已付过利息,其债权债务关系早即成立,姑不问借作何用,均应照约内所注名义负履行责任,不得藉垫款无着为理由,希冀免责。<sup>①</sup>

表面上看,巴县审判厅的审理逻辑,是通过割裂连锁性债务关系,划清军饷垫款与民间借贷之间界限的办法,进而解决吴善平与郑孙氏之间的债务纠纷。但实质上,四川省财政厅承诺筹还吴善平垫款,才是化解这一连锁性债务纠纷的关键。这表明军饷嵌入地方财税体系的现象,以及商人抬垫军饷的债权利益是受到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承认与保护的。在此前提下,吴善平与郑孙氏达成和解,即吴善平偿还本息银280两,折银元366元;郑孙氏义让8个月利息<sup>②</sup>。

上述案件表明,江津县商绅群体构成了防区制时期江津县军饷抬垫的首要群体。他们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民间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手段,另一方面借助他们在商会与收支所的人脉资源,最终实现抬垫军饷的目的。从收益角度看,源源不断的军饷需求已成为商人眼中一笔利润可观的“生意”。从风险角度看,地方司法系统能切实维护与抬垫相关的一切债权利益,进而为商人抬垫提供制度保障。最终,军饷抬垫演变成商人的金融投资,民间金融市场则构成驻地军阀筹集军饷的资金来源。

不可忽视的是,部分城内商人借助民间金融市场以抬垫军饷,客观上不仅助长了军阀势力,而且与军阀势力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合伙对乡村进行税收掠夺。这对商会等民间组织的独立性,以及整个民间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都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 三、乡村富绅抬垫军饷及公平性危机

自明清至民国初年,州县长官已默许或授权里甲组织、差役、团总、税丁等群体先后在乡村抬垫粮税,按时完成田赋征解任务<sup>③</sup>。至防区制时期,乡镇团练组织继续承担基层粮税征收任务。如前文所述,县城内的军饷抬垫主要由商人负责。这种延续了明清传统的筹饷机制(即依托民间金融市场、以粮税为抵押)确实能有效调解了粮税与军饷之间的时间冲突,进而保障军饷的如期如数供应。既然第一层抬垫是以粮税为抵押的定期借贷,那么基层征税组织能否按期偿还商人的抬垫本利,将决定驻守江津的军阀能否维持长期且有序的军饷补给。因此,以下将针对乡村中乡镇团练承担的第二层军饷抬垫过程展开论证。

#### (一) 乡镇团练的抬垫压力

江津县公署与征收局承诺以粮税为抵押,在一定时期内向承担抬垫任务的商人归还本金,并支付

① 《郑孙氏案》(1925年11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633

② 加上之前付的利息98元,吴善平总共偿还本息464元(98+366=464),除去本金420元外,只支付利息44元。按之前每月利息6.5元计算,意味着吴善平仅约支付7个月的利息[(464-420)/6.5≈7],郑孙氏义让了8个月的利息。

③ 娄敏、曹树基:《金融、地权与财税:近代四川粮税抬垫的运作机制与环境》,《学术月刊》2020年第2期。

24%的年息。民间商业资本渗透到基层财税系统,的确为地方政府与驻地军阀增强了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并促成了商人群体等民间社会力量与地方行政组织、司法机构、征税组织以及军事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但这种合作关系要实现长期可持续,还必须依赖乡镇团练的基层征税能力。

事实上,早在防区制度开始形成的1918年,江津县各乡镇团练在执行“就地筹饷”政策时,就已经意识到“税”与“饷”之间依然存在着紧张而难以调和的矛盾。1918年8月,嘉升乡团练局收到县行政署与征收局的训令,为驻地军队借垫军饷3068.7元,解交给该军队的委员兰朝珍。为此,团练局专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具体的借垫办法。最终会议决定该乡粮户“每粮壹石”,应扣(即折)垫款“银拾元”。但偿还粮户垫款的方法并未议定。

按照前文所述,“凭单”是就地筹饷原则的程序性载体,使军饷嵌入地方财产体系内,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遭遇诸多操作性难题,比如:

各粮户持印收完纳,多有正粮较少,垫款倍多,不能分拨,均被征收局没收。众皆痛心切齿,莫奈伊何。我县收支所同团练局员绅,有见于此,始面同征收局商定办法。于九月七号,准地方公款收支所及团练总局函称,适启者以本年各地方所缴借垫,准在粮税扣还,早经履行无异。惟现在粮户所持县局印收,有数百元或数十元,而应纳之粮较少,不能尽数扣还者,扣余之数,似应另还证据,后方有凭补扣。<sup>①</sup>

嘉升乡团练按照“就地筹饷”的原则,向粮户借垫军饷。具体办法是粮户缴纳垫款时,先从征收局处领取“印收”,再用来抵消粮税的凭据,也就是前文所提及的“凭单”。但由于粮税额度远远小于垫款额度,以致粮户难以回收垫款。加之垫款凭单(即印收)面值多达数十元,甚至数百元,因此粮户尚未完全收回垫款时,印收就已被征收局没收,使其失去了今后继续抵消粮税的凭据。

为防止粮户对借垫军饷有所顾虑,嘉升乡团练在经过商议后,决定通过自制小额“散票”来取代征局之前发行的大额“整票”,从而解决“就地筹饷”之实践难题。具体方案如下:

缘征局司事人员有限,不能另换票关申解,又不能批明发还。兹特面同征局商定,仍照原来办法,准各该团局、商会来征局承领预印收据若干张,将所属粮户、商民不能全数扣还之整票收回,听其分填散票,即由各团局商会铃盖戳记,一面造具清册,注明某一票分作几张,连同收回整票,仿□分填存根,一并送缴征局,以凭磨对核销,一面将散票给予各粮户、商民,俾便分别存扣。<sup>②</sup>

此方案虽好,县征收局却以团局与商会印制散票的行为“不合法”为由,直接否决了嘉升乡团练所提出的上述建议,而且也没有给出具体解决方案。驻地军阀所把持的县征收局只管催饷,毫不在乎如何偿还粮户垫款的态度,严重挫伤了乡村富绅的垫款积极性。因此,嘉升乡团练对于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抬粮”任务,十分为难:

明令未知此款究应如何办法,方可扣还。现奉征收局示谕,原历冬月底止即为抬粮期间瞬息即至,各垫户纷纷到局追问,团局实无法可施,若任久悬,将来粮被抬垫,各粮户必遭重累,心何恢复?<sup>③</sup>

显然,该情形使夹在征收局、商会、抬垫商人与纳税粮户之间的乡镇团练面临极大的征税压力。为不影响粮税抬垫工作,嘉升乡团练连续数月向县征收局反复申请,并坦言:“借款不得扣还,即粮税亦因而牵制”。最终,江津县征收局被迫接受了嘉升乡的“换票”意见,规定垫户持整票可换取由征收局统一印制、团练总局转发的散票,以继续抵消每年的粮税(或契税或杂税)。

①《嘉升乡张杏抡等缴垫捐票》(1918年),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29-00095。

②同①。

③同①。

然而,换票办法毕竟不能满足垫户们追还垫款的急切需求。加之1920年代川军与黔军在江津县呈现胶着的拉锯状态,驻地军阀筹饷次数与总量都明显增多,进而使那些承担抬垫军饷任务的粮户(甚至有基层半公职人员,如团副)直接向县知事递交状书,追还垫款<sup>①</sup>。在这些状书中,充当征税任务的乡镇团练往往成为此类案件的被告。

除此之外,由于县城内商人抬垫军饷多以粮税为抵押,因此,乡镇团练还直接承担偿还商人垫款的债务责任,甚至因此屡屡陷入被商会追债的尴尬境地。以1932年的军饷抬垫为例。1月15日,江津县征收局交给商会“划款执据”,商会持有该凭据向乡镇团务办事处催还此次垫款,并要求对方于二月底三月半还款。但期限终止时,仍有七个乡镇未能如数还款,拖欠金额为7600元,占此次垫款的95%<sup>②</sup>。

面对商会的追款,江津县九如镇区保卫团(团练办事处下属机构)办事处职员陶伯皋,于3月13日到油溪场会见聂团总,询问拖欠原因。根据陶伯皋写给商会会长的信件内容来看,油溪场之所以无法按期还款,原因有三:其一,粮税所收不多,意思是团练征税能力不足,进而导致税额不足;其二,征收局每期均有摊缴,这表明,团务办事处不仅要偿还商会垫款,还有许多其他的分期摊还;其三,除了要完成征收局的催征任务,团务办事处还需应付当地驻军刘师部之团款附加的要求。总之,虽然有固定且单一的税源,但上级催征名目繁多,这使得团务办事处收支所饱受征税压力。直至1937年,仍有乡镇团练未能及时偿还抬垫本息。

为完成因大量军饷而衍生的繁重的税收任务,乡镇团练不得不将此压力转移至乡村富绅身上。由于偿还商人抬垫本息的期限是固定的,如果团练不能及时完成征税任务,则有可能会引发上文所述之商人抬垫纠纷,势必会影响乡镇团练公职人员的政绩与个人升迁。因此,防区制时期乡镇团练组织普遍采用传统的抬垫办法解决燃眉之急,且以粮税或地租多寡为依据,将垫款责任分摊给乡村中田产收益较多的富绅。

## (二)乡村富绅摊派垫款及纠纷

既然乡镇团练以粮税或地租多寡为依据将垫款摊派给富绅,那么田产收益愈多,则垫款额度愈高。随着军饷抬垫越来越频繁,粮税征收的次数也随之增多(名为粮税预征,实为军饷抬垫),这导致承担田产收益较多的富绅怨声载道,甚至出现富绅为逃避垫款负担而迁居他乡,以及富绅之间相互揭发对方产业的社会现象,进而引发乡镇团练与富绅之间关于“军饷垫款”摊派不公平的诉讼纠纷。此处以吴安国案为例。

1924年1月29日,江津县七星镇团总杨济安、副团总曹赓三等人向县知事递交呈文,控诉该镇第四团富绅吴安国“抗不缴纳”边防军垫款洋三百元。吴安国为躲避团务捐款(170元)与军饷垫款(300元),“迁避白沙”。团总杨济安因此谴责吴安国为富不仁,不顾公众利益<sup>③</sup>。据此可见,团务捐款与军饷垫款已成为地方民众(尤其是富绅)不能拒绝的税责。如有逃避垫款情形,担负征税责任的乡镇团练组织将上诉至县知事,利用司法手段“签拘”逃税者,以追还垫款。

在基层征税实践过程中,摊派不公通常是导致民众拒缴的重要原因。吴安国案即是典型。1924年2月2日,吴安国向县知事递交具状书,详细陈述自己拒缴垫款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团总杨济安等人滥权勒派团款;其二,杨济安公报私仇,故意重派垫款,摊派不公。其中,摊派不公现象是吴安国陈述的重点。详情如下:

缘借垫一端本以粮税作抵,在民只有粮税一石余,即负担四五十元,将来尚难除尽。况七星镇与民同等粮户,不下二十余人,并未派及五六十元;其上而纳租四五百石、七八百石者数

①《刘煥文告蓝孔章案》(1921年8月16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155。《再用樟以藉垫团费恳签追偿案》(1921年11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341。《嘉乐乡张江氏等以借垫无着请示一案》(1922年4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414。

②《江津商会樊主席关于催还垫款给乡镇团练办事处的公函》(1932年1月15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11-0001-00434。

③《吴安国案》(1924年1月29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550。



人,犹未负担百余元。如谓济安等非属挟民具控前嫌,何致有派及民垫款贰百五十元之风响?因而骇人听闻。总之,人民之所有权不受侵犯,但公益上之必要处分,依法律之所定,现为十二年十月十日宣布之民国宪法规定,则民依法应负之纳税义务倍言之多,亦不过五十元。<sup>①</sup>

状书中的原告吴安国籍贯为白沙镇(1914年自七星镇迁往白沙镇),因其在原居住地七星镇还坐拥部分田产(每年收租75石),故需根据粮税额度承担军饷垫款。可见,迁移他处并不能完全摆脱原籍的税责,吴安国对此似乎并无异议。但吴安国认为七星镇团总杨济安等人在摊派与征收垫款的过程中有失公允,因此故意连续两年拒缴垫款。为追缴垫款,团总杨济安甚至将吴安国的儿子与佃户龚辉廷逮捕,“滥权凌磨”<sup>②</sup>。

与吴安国一同递交控诉呈文的还有前川东法政毕业生曹裕如,为证明垫款摊派不均现象,曹裕如详细描述了1924年七星镇的垫款摊派状况:

县署奉国军三十二师师长唐,川东宣抚使兼三混成旅长李、黔军第四混成旅长王会銜派七星镇借垫洋二千八百元,为生提派洋二百元之多。以全镇粮户计算,每年纳租一百石,或二三百石者,不下三十余人,而三四百石、五六百石以至于千石者,尚有数人。若以生兄弟二人共纳田租三百石,即应借垫洋二百元,则与生家资同等或特别者一律照派,未免超出二千八百元三分之二以上。<sup>③</sup>

如上所述,1924年,七星镇被驻地军阀派“借垫洋”2800元。所谓“借垫洋”,类似于抬垫,但与城内商人抬垫方式不同的是,乡镇富绅们的垫款需以自己应缴粮税为抵押。但如上文所提及的那样,税责轻,垫款重,若以扣抵粮税的办法追还垫款,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乡村中的军饷抬垫,本质上更类似于强制性的粮税摊派。

长此以往,很多富绅开始抱怨“借垫”额度太多,怀疑乡镇团练在摊派过程中公报私仇。比如曹裕如兄弟二人在七星镇拥有田产,年收益约300石,应缴粮税3石,但团总杨济安等人令他们承担200元。若以此为标准,再按照本镇其他富绅的田产收益额度来看,七星镇将筹饷银4667元,即“超出二千八百元三分之二以上”。因此,曹裕如认为,在不超出固定饷银的前提下,杨济安等人的摊派行为必然是有失公平的。并且,其他团甲甚至以全团或全甲为单位派发,总额仅数十元,或数百元。为何杨济安等人单独对曹氏兄弟二人派洋二百元呢?此外,曹裕如还指责团总杨济安与罗善初等人逃漏摊派责任,详情如下:

团总杨济安年纳田租二百余石,罗善初年纳田租百余石,究自承垫若干元,亦未明白当众表示。以生所闻,仅垫十余元。善初若未垫及一元也者。矧济安等均有钜大之流动财产,惟济安尤多,实有朱沱场锅厂入股本千两,及借出银两甚众。<sup>④</sup>

杨济安等人本身是乡村中的基层征税人员,他们同样也拥有较多的田产收益,但却未承担相应的垫款。更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曹裕如,还是团总杨济安等人,都以个人财富:即以粮税或地租多寡作为摊派垫款的唯一标准。这大概也是团总杨济安将上千两的大额资本投入手工业的关键性原因。总体看来,曹裕如和吴安国两份诉状的共同诉求只是要求团总杨济安等人“持平秉正”,并未对因军饷而产生的垫款负担产生丝毫抱怨,反而还高度认同与配合基层财税支配者之四川军费统筹处的预征政策,即所谓“恐人民益滋扰累之意旨”。

为论证军饷摊派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不公平现象,曹裕如还列举两个例子。其一,摊派额度前后不一。1923年,七星镇接到同样的军饷抬垫任务时,团正曹巨孚仅要求曹裕如缴纳垫款30元;至1924年,

①《吴安国案》(1924年2月2日),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550。

②《吴安国与龚辉廷案》(1924年5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550。

③《曹裕如呈文》(1924年2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550。

④同上。

七星镇团总杨济安却以“特别富户”“特别富绅”为由强制曹裕如垫款200元。同样是2700元的军饷垫款,两次摊派额度竟然相差近7倍。

其二,垫款摊派不公平,“徒凭喜怒,挟嫌重派”。与吴安国呈文类似,曹裕如也提及自己曾触怒过杨济安,吴与曹均认为杨济安利用垫款一事公报私仇;再者,杨济安还为自己及当地最富裕人士杨裕辉逃脱了本应承担的大额垫款责任。杨济安与杨裕辉均为杨姓,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亲属关系。不难看出,团总杨济安等人利用职权之便转嫁垫款责任,其实质是损人利己。

由于杨济安等人的行为招致了七星镇地方士绅和部分富户的强烈不满。自1924年1月起,七星镇先后有数十人向江津县行政公署、四川第一高等分厅、援川各军司令部、四川督军署等机构递交呈文或状书。为解决此事,1924年2月12日,四川军费统筹处给江津县知事下达训令,要求县知事调查该县团总杨济安等派款不公是否属实,并强调“如果所呈不虚,即令飭该团总等秉公办理,免滋扰累”<sup>①</sup>。

连年甚至一年多次的军饷摊派,兼之按以粮税或地租多寡摊派垫款的征税策略(亦可称之“吃大户”的预征策略),对乡村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较大冲击。因为乡村富绅不仅移居至县城,而且还改变了他们以往的投资方向,即不再继续投身于土地金融市场,而是转移到手工业、商业或者工矿产业。这可能也是1920年代以后四川农村经济趋于破产的结构性原因。

## 结 论

本文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出发,以军饷为切入点,对四川军阀何以能够维持长达十七年的割据统治的问题展开探讨。得出以下两大原因:

其一,军饷被纳入地方财税范畴。民国初年的财税整理措施,使军饷嵌入自省、县至乡镇的财税系统中,地方财政的军事化特征十分显著<sup>②</sup>。这是防区制时期筹饷机制形成的制度环境。

其二,在县城与乡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筹饷策略。县城内,“军饷”是商人投机性的牟利生意。在征收局、收支所与商会的操作下,富裕商人充当军饷抬垫的主体,并从中赚取了十分可观的抬垫利息。抬垫的本质是借贷,体现了民间资本对官方财税领域的渗透,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高度依赖。民间金融市场为各军阀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来源,维持了防区体制下长达十七年的军阀割据统治。

在乡村,“军饷”则是一种强制性的税收预征,征收对象主要是那些田产收益较多的富绅群体。本文将此称为“吃大户”的预征策略。该策略也能解释为什么档案文献中保存了较多的乡镇团练与富绅大户之间基于征税标准是否“公平”的诉讼纠纷,而少有粮户因税责过重而抗税的案件。这种“吃大户”的预征策略,不仅有助于提高基层征税效率,而且还能规避因对贫困粮户频繁征税而导致的暴力抗税风险。

综上,所谓筹饷机制,是指地方政府通过“抬垫”方式完成军饷任务,具体可分为县城内的商人借贷与乡村内的强制“预征”两个阶段。其本质是地方财政军事化与民间金融市场相互作用的产物。该机制既借助了民间金融市场的资本力量以增强其资源汲取效率,又兼顾了乡村基层社会的稳定性,进而为驻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军饷。

需注意的是,这种筹饷机制对基层社会结构与经济秩序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严重的公平性危机。在此背景下,地方精英与金融资本逐渐从乡村向城市加速流动,近代以来衍生的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曹裕如呈文》(1924年2月),江津区档案馆藏,档号:J007-0018-00550。

②曹树基:《军饷与税收:民国时期四川军队与商人的关系——以江津商业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5期。